



云南省高等学校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智库资助项目

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丛书

主编 王德强

互嵌式社会与民族团结

人类学的视角



张少春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云南省高等学校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智库资助项目

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丛书

主编 王德强

互嵌式社会与民族团结

人类学的视角



张少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嵌式社会与民族团结：人类学的视角 / 张少春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

（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丛书）

ISBN 978-7-5201-2491-1

I. ①互… II. ①张… III. ①民族团结-研究-中国

IV. ①D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899 号

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丛书

互嵌式社会与民族团结：人类学的视角

著 者 / 张少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责任编辑 / 周志静 韩莹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3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491-1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德强

20 世纪末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开端，在“冷战”体系下长期压抑且得不到释放的族裔主义，开始全面复苏和爆发，伴随着国家裂变、民族纷争、种族仇杀、宗教复古、原住民运动、泛民族主义运动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再次凸显。

超级大国美国“种族主义”重新泛起，“黑白之争”连续升温并持续发酵；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让全世界哗然。在英国寻求脱欧之际，2014 年苏格兰举行了独立公投，仅两年之后，苏格兰宣布再次“脱欧”公投，“分还是合”的古老命题仍困扰着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欧洲浪漫之都巴黎的恐怖袭击震惊世界，折射出自由法国乃至欧洲深层次的民族宗教矛盾。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局势的蛮横干涉，导致的欧洲难民危机，反射出冷战之后的霸权主义仍挥之不去。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大国角力和博弈的竞技场。乌克兰危机既凸显出“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又折射出该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缅北冲突持续不断，昂山素季重启 21 世纪彬龙会议的计划，步履维艰。

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人类社会是民族的大千世界，当今世界仍有两三千个民族。民族多，国家少；多民族国家多，单一民族国家少，是当今世界的常态。如何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实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国民整合，是世界性的

难题。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观念和实践多以消除差异为目标，其手段不外乎武力征服、强迫同化、驱赶围困，甚至赶尽杀绝。这种手段或政策，在西方殖民主义时代形成了通则，并被推向极致，为今天世界民族问题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产”。

殖民时代结束后，随着同化、熔炉政策的整体性失败，多元文化主义开始成为西方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潮流，但是好景不长，“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接踵而来，与之相呼应，“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世界许多国家似乎对多样性失去了兴致，对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失去了耐心、穷尽了智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多民族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缔造了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辉煌事业。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国家学说，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现状，明确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一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目标和实现形式。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要并入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浪潮中，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进步思想的萌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民族平等政策，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凡是居住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汉人占多数的区域，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而不加任何限制。1934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中首次提出了民族团结的主张，指出不分党派、职业、民族、性别、信仰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团结各民族，并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积累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国内各种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

张，1937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抗日的民族团结”，主张全民族的联合和一致对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坚持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政策。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事务的政策主张从民族“联合”走向民族“团结”，并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了从民族“联合”到民族“团结”的根本转型。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当时的形势，把抗战时期民族团结、抗日救国的政策主张，发展为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建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947年5月，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的内蒙古“独立自主”的错误倾向和分裂活动，中央明确提出建立第一个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的内涵，并成为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创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团结；在民族地区政权建设进程中把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因地制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增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毛泽东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为访问团壮行，访问团累计行程8万多公里，足迹遍布除西藏、台湾外的所有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继而又开展了民族大调查、民族识别等工作，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多民族国情的认识，为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促进民族团结创造了条件，分类指导，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终结了民族压迫、剥削、歧视的历史，全面建立了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

展的崭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民族团结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各民族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民族工作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末，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同时开辟了巩固和加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正确航道。1979 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确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普遍地、深入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认真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切实解决存在于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消除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精神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性地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重要思想，并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基本认识。同时，根据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及时将民族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加大民族政策贯彻落实力度，特别强调了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并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民族工作主题。“两个共同”的思想深刻阐释了维护民族团结和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辩证关系。在实践层面制定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实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三个专项规划，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专门研究部署加快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定期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全面、深入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等等。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不仅保持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而且将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与变化，全面分析和科学研判我国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深入研究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民族工作的时代要求，提出了一

系列关于做好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彻底澄清了近年来民族工作领域理论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切实纠正了实践中的一些不当做法，开启了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航程。民族地区的五大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全面展开、深入发展。

在理论层面，深化了对多民族国情的认识，强调多民族是“特色”、是“有利因素”，多元一体是“重要财富”、是“重要优势”。这一新定位、新认识，为族际交往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提供了内在根据；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是大家庭里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快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夯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物质基础指明了方向。

在实践层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要做到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并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物质层面的问题要靠物质力量、靠发展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精神力量、靠思想教育来解决。强调法律保障和争取人心并重：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要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又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强调要在全社会不留死角地搞好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应少做“漫灌”，多做“滴灌”和精耕细作。强调城市民族工作中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既不能搞关门主义，也不能放任自流，关键是要抓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两头对接，着力点是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民族事务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阶段民族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由云南省高等学校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智库推出的“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丛书”全面总结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深刻阐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深入揭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研究推进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期冀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并通过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普世价值和意义，为化解“文明冲突”和民族纷争，促进文明互鉴、族际和谐提供借鉴。

2017年4月22日于临沧

序 一

王希恩

“民族互嵌”和“民族团结”都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后者念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近几年来却特别“火”；前者虽然自2014年才经中央有关会议提出，但各类研究成果已经不绝如缕。要在这样两个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上做出新鲜东西来实属不易。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年轻同事，张少春博士毅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有难度的课题，而且真的做得不错。

关于“民族互嵌”，中央相关的表述是“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里明确是讲“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并不只是“社区环境”。少春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后批评说，不少文章在解读“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过程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嵌入式社区”，有简化这一重大战略的倾向。他认为“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致力的应是解决新时期我国民族团结的全局性问题，不能局限于某地，也不能局限于城市，嵌入式社区建设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其意义在于通过空间上的嵌入式居住，强化民族间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团结。因而他提出应走出“嵌入式社区”，从根本上形成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应当说这是少春这本书着力表现的一个观点，很有见地。

作者花了足够的篇幅从词源学和概念史的角度对“嵌入”和“社区”两个概念做了解读。之后，用了闽宁镇的劳动力市场、阿拉善左旗

的传统资源与公共文化建设、红寺堡的社区环境与社会心态、木座寨的纠纷矛盾与社会控制、宝赠村的村寨交往与文化规则、黄家村的天主教会与乡村生活等六个个案，分别从经济、文化、空间、社会、民俗、宗教等六大方面讨论了不同领域的互嵌特征及背后的共性生成问题，充分展示了“嵌入”本身具有的诸多面向，表达出了他的核心思想：在民族团结的语境中讨论“相互嵌入”，应是指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全面“嵌入”，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联结互动为一个整体；而经过经济、文化、空间、社会、民俗、宗教等领域多元相互嵌入、共同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便是各民族逐步深化团结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过程。

纵观全书，从研究综述和提出问题，到引入研究视角和调查个案，再到结语的提炼，结构清晰、首尾一体、观点明确，不能不说这是一部给人以启发和拓展视野的佳作。

在对核心观点和材料的陈述过程中，作者不时表达出的一些研究心得构成了全书不可或缺的精彩之处。如他对当下流行的“社会团结”和“民族团结”概念的甄别，认为“社会团结”主要讨论的是人与人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何以组织起来的问题；而“民族团结”不是个体的结合，主要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即族际团结，是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如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这个共同体在民族平等、经济依存、社会互嵌、文化兼容四方面不可分割的认识，是对这个共同体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共同命运的认识，是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格局的认识，根本上是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和理解。这些认识或心得在书中时有所现，为全书增色不少。有研究经历的人都知道，“灵感”的出现和表达或是作者一时的神来之笔，但其背后是持续而不懈的思考。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顿悟，更能看到他的执着。

显然与作者的学术背景有关，全书对研究方法和视角着墨颇多，其中一节“人类学视角”专门涉及这个问题。作者直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动民族理论研究的新思考是本书的目标。或者更明确讲，本书是“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开展民族理论

的研究”。“民族互嵌”无疑属于“民族理论”的研究内容，因为它是一种政策导向，也是一种理论范畴。民族理论学科的特征或使命就是从宏观上探讨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和解决民族问题途径。

关于怎样将人类学方法纳入民族理论研究，作者首先秉承了人类学强调的田野调查传统。在入职不长的几年内，少春待在所内的时间并不长，而是主动或借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调研。本书选取的个案清晰地留下他的调研足迹。但可贵的是少春并没有沉溺于田野资料的简单获取，而是不断思考，将其融入更为广阔和普遍的问题。比如他讲，本书借用“社区研究”的方法来开展“互嵌式社会”研究，不是要做具体社区的研究，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窗口”，通过小的个案去观察超出社区边界的宏大进程和理论问题。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开展民族理论研究，在“社区研究”的方法论确定之后，还必须特别注意个案与理论如何衔接的问题；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识到，“互嵌式社会”研究可以做小问题的切片，但却不能局限于社会与文化的片断，把它们与宏大问题的有机联系割断，应该顺藤摸瓜将小村寨放置在它所处的大网络中来观察。避免这种局限，既不是以大统小，也不是以小见大，而是要将大和小联系起来，将国家的力量同地方的肌体、国家的制度与地方的操作、国家的政策与地方的实践结合起来。民族理论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必须兼顾中央宏观原则和地方具体实践，也必须兼顾向后看与向前看两种取向，同时还需要借鉴我国历史与外部治理实践两种经验。

这些话语显然和传统“民族理论”有着隔膜，但并非不能相容。中国的民族理论从来就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容纳着多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理念，也承担着既宏观又具象、既理论又现实的责任。如此，它没有也绝不会拒绝与它有着很多重合点的人类学的介入。少春是人类学博士，目前从事的又是民族理论研究，他深知二者的深浅，探索着如何实现突破，如何扬长避短。看得出，这本著作已经凝聚了他将二者结合的学术自觉和自信。我相信，它既是一个研究如何实现“互嵌式社会和民族团结”的样本，又是实现人类学与民族理论研究结合的样本。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作为一个“85后”年轻学

人，少春博士在短短的几年内既已拿出这样一本有厚度的研究成果，我深感欣慰，寄他以厚望。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可望在年轻一辈的努力中不断走向进步。

2018 年 4 月 1 日于北京

序 二

麻国庆

摆在手边的《互嵌式社会与民族团结：人类学的视角》书稿我是三月底看到的，其中有的社区比较熟悉，有的则比较陌生。像四川平武白马藏人和广西龙胜侗族的田野点，是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指导少春和他的同门们开展“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研究时开拓的。四川平武的白马藏人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先生1978年发表的《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正是以“平武藏人”的识别为例，提到要“把北自甘肃，南至西藏西南的察隅、珞瑜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民族走廊”的概念正是发端于此。

当时我指导学生们开展“民族走廊”的研究，正是想强调走廊地带的人类学定位及其意义。在中国多民族交接地带，贸易、婚姻、文化、习俗、宗教等相互交融与叠加，为超越时空限制来理解民族区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提供了恰当的研究视角。“民族走廊”的理论意义在于，可以将“多元一体”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过程放置到一个具体的空间范围内，从而对于多元如何结成一体形成新的理解。延伸来看，这个空间既可以是山川河流造就的广阔走廊，也可以是因为移民搬迁、民族交往、文化传播所形成的具体的社区。在民族走廊地带、民族结合部有很多这样的村寨，多元的民族、社会、文化和经济体系在社区内相交汇，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体特征。

很明显，少春延续了当时我们讨论的问题。他从各地的个案出发，研究了不同社区内部经济、社会、文化、民俗和宗教等领域多元因素如何杂糅与叠加，塑造出一个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但是他并没有全面地考察社区各个方面的多元体系如何达成共同性，而是从社区生活的某个面向着手。比如平武木座寨关注的是社会控制，书中发现当地社区内外的社会控制处于一套跨体系的社会规则下，为新的社会整合建立了基础。而地处“南岭走廊”的龙胜宝赠寨则是通过“欠”与“还”的文化逻辑，将村寨交往中的互惠原则实践和维持下来，在当地整合出具有区域公共性的民俗文化。

而那些新的田野点，是少春 2014 年进入 6 号楼工作开始慢慢积累的。民族所理论研究室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现实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曾经推出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汇编等一批重要的成果。他原来在中山大学一直接受人类学的训练，进入民族理论研究室后，开始尝试一些新的研究。本书所讨论“互嵌式社会”的问题，正是他对于理解中国民族团结的一种努力。他研究的是“民族团结”“互嵌式社会”等民族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主题，但不是从政策文本出发，而是以人类学者熟悉的生计方式、文化变迁、社会控制等概念来展开。书中所讨论的几个社区涉及不同地域、民族，也是在类型比较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中国民族团结经验层面的社会与文化解释。

以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事实上由来已久。人类学在英国创建之初，就是为了认识境外殖民地的“他者”，从而为殖民帝国服务。而起源欧洲大陆的民族学，主要关注内部的“他者”如何达成认同上的共识，以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这两门学科引入中国，一开始就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联系在一起。整个 20 世纪前半叶，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前辈们或投身田野，或钩沉史海，研究了国家与民族、中华民族与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回应的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困境。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的自觉，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观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和学术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学人类学者曾广泛参与到民族识别、少数民

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等工作当中，为落实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推动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贡献了力量。这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所以说在我国民族研究相关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各个领域原本就是相互借鉴、相互交叉的。如果我们回顾老一辈学者的工作，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线，而是把传统思想中“格物”和“致用”、“道学问”和“尊德性”的取向融汇在他们的研究当中。追求真理的专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责任感使命感并存于他们的学术生涯。正如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反思自己的研究时就指出，他与同时代的学者都带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

但是在学科体系规范化的过程中，人类学与民族理论逐渐发展为不同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两者之间的分野才固定化了。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主要的研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重在研究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发展中的宏观理论问题，总结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经验。与这类研究相联系的是人类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研究，即通过研究民族形成、发展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

研究主题上的交叉是容易实现的，但人类学与民族理论学科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民族这一研究对象的想法。民族理论研究将“民族”视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身份，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是其基础，强调概念的政治性和确定性。而人类学者则将“民族”作为诸多社会身份的一种，与性别、年龄、信仰和阶级等身份并无二致。正是因为这一点，“民族”与“族群”这对概念相纠结，才引发了“实体论”与“建构论”的讨论。并在多年之后的“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理论争论中也能看到影响。

我曾经在《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一文中指出，“民族”概念的演变是从模糊到确定，而“族群”的使用则是从清晰到暧昧。“民族”指涉的是“社会中的民族”，即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中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互动，强调的是民族在社会中的单位特征。而“族群”概念主要适于讨论“民族中的社会”，即在某一民族内部或多民族杂居地域不同群体的人们如何展开互动。“族群”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

民族现象的复杂性，破解了单一民族研究的束缚。

“民族”与“族群”的“名实之争”反映了社会科学“实在论”与“建构论”的二元对立。而费孝通先生 1988 年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则是超越了这种非此即彼的论述模式。一般民族理论学界较为关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揭示的双层结构。而对于民族学人类学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总结提炼出怎样的“格局”，更是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问题。多元不是强调分离，只是必须坚持平等；一体不是要消灭多元，而是要加强团结。其核心是强调多元中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

将多元纳入共生的有机联系中，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才得以展现出来。少春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从社区内部多元体系如何达成共同性来理解“互嵌式社会”中的民族团结。民族团结不是融为一体，而是强调各民族经由各种有机的联系团结在多民族国家之内。这种有机的联系既可以是生计的，还可能是文化的。这本书正是从经济、文化、空间、社会、民俗、宗教等六大面向，讨论不同领域的互嵌性特征，特别是背后的共同性如何生成和表现的问题。他提到：“各个领域多元相互嵌入，共同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便是各民族逐步深化团结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过程。”为民族团结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人类学的新视角。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当前阶段我国的民族工作具有“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目前许多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单位，将民族界线延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族别研究。民族现象包含历史、经济、文化与心理等维度。要发展适应新时期阶段性特征的民族学，就必须从民族现象的基本维度出发，突破民族单位的限制。民族是在历史、生产、语言、文化、风俗以及心理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学人类学应该对民族现象中的历史记忆、经济活动、文化习惯、心理认同与宗教生活等领域的转型过程予以持续的关注。要重视这个过程中多种因素、多种力量、多种趋势并存的复杂性，关注跨越民族、区域、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性领域建构过程。

这就需要把理论研究的宏观视野与经验研究的微观视角结合起来，推进我们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从现实出发的民族研究不应局限于具体